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社会结构转型/李培林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3

ISBN 7-80190-433-8

I. 另... II. 李... III. 社会发展-中国-现代-文集
IV. D6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1162 号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社会结构转型

著 者 / 李培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65286768

项目经理 / 邓泳红

责任编辑 / 云 纤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20.25

字 数 / 331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433-8/D·128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我的研究理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建议我整理出版自己的文集，但我对此一直非常迟疑，总感到已发表的文章达不到出版文集的分量，而且时过境迁，自己对以前发表的东西总是觉得不太满意。但在谢社长的一再催促下，我想通过整理文集，厘清自己的研究理路，对于自己把握好今后学术研究的定位，也是有好处的。

这里选出的是近十几年来发表的 18 篇文章，其中有 7 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有 6 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还有几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和《中国人口科学》等杂志。

这些文章中的有些观点、看法、判断和解释，在今天看来可能很值得商榷，但我无意做任何的改变，因为它们记录着我的研究和学术思想的真实轨迹。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曾被《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 5 期作为头篇文章发表，它随后获得“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成果奖”三个一等奖之一（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尽管今天看来理论上是有许多欠缺，但它对于推动把社会结构转型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于推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是发挥了作用的。

《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发表在 1995 年第 3 期。那个时候关于这个论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不仅仅有学术上的争议，政治上也有很大的争议。由于《人民日报》用半版转发这篇文章的内容，使我处于了争论的漩涡，尽管不少人认为文章能够直面重大的现实问题，并提出有解释力的论证，但批评的意见也很激烈。一派认为这是“海归派”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解读中国的现实，另一派认为这是“粉饰现实”的虚假乐观主义，这些并非都是学术层面的批评，当时给我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但我坚持认为，尽管改革以来利益格局的变化存在很多难解之结，但中国绝不能走回头路。进入 21 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改革方向上的共识逐步形成，而贫富的分化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出现开始缩小的转折点，而是加速扩大。我的看法也有了改变，开始认为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会造成很多人对改革预期

2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的转变，从而成为中国发展的潜在风险。于是我写了《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一文，这是我在利益格局分析上的一个判断的转折。

《老工业基地的失业治理：后工业化和市场化——东北地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作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的头篇文章发表。当时我一直期望，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会在1990年代中期从珠江三角洲转向长江三角洲之后，能够继续北移，从而带动东北的重新崛起。但随后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推迟实行。不过这项从就业问题入手的研究，却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推动扩大教育的政策效果。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关于“扩大教育、推迟就业、缓解失业”的政策建议，通过一定渠道反映上去，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促进了中国高等院校连续数年扩大招生政策的实施。现在看来，尽管高校扩招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但这个决策对于提高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竞争力还是利大于弊的。

在我的研究理路中，我一直期望自己保持对“真实世界”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一是现实层面的，就是努力解读和回答那些重大的实践问题；二是学术层面的，就是注重那些具有知识积累意义的前沿问题。读者可以从《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对中国10个大城市508家企业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网络化：企业组织变化的新趋势——北京中关村2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等文中，看到我在探索学术问

们一直在期盼的一个新的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选择。

这个新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它是建立在中国正在“和平崛起”的经验基础上。正是“中国经验”的基础，使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对社会学来说，协调发展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思想，社会学建立的160多年来，经典的社会学家都在反复地重申这个主题：协调、秩序、进步等等。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学的追求“协调”、经济学的追求“均衡”、法学的追求“公正”、政治学的追求“合作”，这都是一贯的学科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协调、均衡、公正和合作，绝对化的协调、均衡，就会沦为缺乏激励和活力的平均主义，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发展的突破和超越，恰恰是打破原有的所谓协调和均衡。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要破除绝对的平均主义，增加激励，加快发展的速度，甚至是实现超常规的发展。然而，这种超常规的发展也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新的失调和失衡，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调和失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科学发展观里的重要价值，它的内涵的精髓，来自“中国经验”的基础。

现在的一个现象是，国外的多数学者比国内的学者似乎更看好中国的发展，国外学者中尽管也有说“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增长有水分”的一派，但更多的是认为中国的超常规发展将打破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无论是提出“中国的奇迹”、“中国正在崛起”的还是提出“中国威胁论”的，都是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趋势。而且他们从过去历史上国家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带来国际均势失衡的经验出发，很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难以预测的结果。但国内的学者接触现实生活问题比较多，他们的经验感受远远超出GDP的增长率，他们反而更容易对那些诸如中国的就业、收入分配、城乡差距、社会保障、腐败等难点问题忧心忡忡。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口和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很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人口小国来说的彰显成就，除上13亿人口也许算不上什么，而任何微小误差乘上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天大的问题。比如GDP的增长率，由于中国目前每年仍净增长800多万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约1/30，所以中国经济增长8%，只相当于日本增长2%，因此尽管有“崛起的中国、沉没的日本”的说法，我们自己不要昏了头的飘飘然。艾滋病、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这种看似不大的问题，对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都有可能演变成大问题。

4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来肯定会改写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的很多假设，会修改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一些既有规则，至少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是这样。这是因为一个 13 亿人口大国的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很多超出我们一般所说的“常态社会”的新经验。

长期以来，社会学的主流，就是研究“常态社会”，即认为在常态的情况下，社会的变迁是按照一定的既有规则进行的，即便是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也是长期变化积累的结果。社会学的主流思想，是坚信人的理性力量和社会发展的有序性，认为在社会发展领域不存在无法追寻因果关系的“裂变”和“突进”。所以，即便是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越轨社会学”、“灾难社会学”等等，也都是从“常态社会”的角度来考虑。社会学以往对失业、人口过多、贫富差距、贫困、疾病、犯罪、教育短缺、社会保障不足、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也都是从“常态社会”的假设出发，把这些社会问题视为“常态社会”秩序的“失范”而已。

而且，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国际社会学界也被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所笼罩，从贝尔（D.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托夫勒（A. Toffler）的《大趋势》到卡斯特（M.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兴起》，都在描述一种信息社会的令人振奋的前景。人们一直相信，我们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社会的控制，将是一路凯歌的，新的技术进步将会自然解决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问题。当然，国际社会学中过去也一直存在着悲观主义的危机学派，特别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正当西方发达国家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一些学者从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角度，发出惊世骇俗的警告。近年来也有从文化角度提出预警的，如亨廷顿（S.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福山（F. Fukuyama）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但这类危机的判断，常常被学术界主流排除在“规范研究”之外，总认为类似的危机预言，虽然轰动一时，但总是时过云散，因为人类的理性战无不胜，煤没有了我们有石油，石油没有了我们还有核电。直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 Beck）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 Giddens），通过“规范研究”提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国际社会学界才开始认真地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面对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常态社会”的“风险社会”。但国内社会学界，由于大家集中关注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中的发展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反思“风险社会”理论对认识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意义。

“中国经验”这个概念，对于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非常重要。

从“中国经验”出发，我们才能真实地了解中国发展中诸多社会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这些临界点单凭既有的规则是推论不出来的，不顾前提条件和约束单从原则推论出的结论往往会是虚假的。比如说贫富差距问题，规则中有一条是差距随发展先扩大后缩小的库兹涅茨（S. Kuznets）“倒 U 型”曲线，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如人均 GDP1000 美元），会出现人口增长停滞、劳动力紧缺，劳工的谈判和讨价还价能力大为增强，从而致使劳动力相对收益增长、资本相对收益下降，但中国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殊情况，所以近十年来在资本和技术收益都大大提高的同时，农民工的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农民工的权益也必须由政府出面来加强保护，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呈现快速加大的趋势。再比如粮食问题，十几年前国外就有“谁来养活中国”的说法，中国也的确每年耕地都在大量减少，而人口每年还在大量增加，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粮食没有发生短缺，粮价在没有大幅度增加粮食进口的情况下也没有飞涨。什么原因呢？数亿人的消费结构变化会改变很多问题，水产品、蔬菜、水果、奶制品的大量增产，使城市人均年消费粮食从 20 年前的 150 公斤下降到今天的不到 80 公斤。我并不是说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重要，但在我看来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是“谷贱伤农”造成的抛荒，而不是农民的种植结构变化。再比如艾滋病防治问题，以前中国对这个问题缺乏正视，甚至有点“家丑不可外扬”似的，现在中国政府公开向艾滋病宣战了，因为 SARS 危机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密集大国，虽然 84 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对中国来说成人感染率不到 1%，但我们并不清楚到什么临界点它就会超出常规的几何速度扩散。中国的人口总量对一些既有规则的改变，增加了中国发展中社会风险的“突发性”、“不确定性”、“难以预见性”。

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理论，才会产生它独有的学术魅力和影响世界的“中国学派”，而这个“中国学派”，将探索一条中国走向“现代和谐社会”的新路。这条新路对国际意味着，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带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对世界和平、稳定、进步的贡献，而绝不会是威胁；这条新路对中国自身意味着，中国决心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道路，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走有社会活力的共同富裕道路，坚决防止经济、社会、自然的重大失调，坚决防止一切权贵资本主义倾向。

李培林

2005 年 1 月于北京

CONTENTS

目 录

前言 我的研究理路	1
-----------------	---

社会转型研究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3
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19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	31
中国经济改革的“特色”	45

社会分层研究

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	61
再析新时期利益格局变动中的若干热点问题	79
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	98
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	106

企业组织研究

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

——对中国 10 个大城市 508 家企业的调查	121
--------------------------------	-----

网络化：企业组织变化的新趋势

——北京中关村 200 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	137
------------------------------	-----

就 业 研 究

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

——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 157

老工业基地的失业治理：后工业化和市场化

——东北地区 9 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 177

走出国有企业的人员过密化逻辑 194

中国就业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205

乡 村 研 究

中国百年来乡村工业化的道路与模式 221

中国乡村里的都市工业 263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 277

巨变：村落的终结

——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295

目 录

CONTENTS

Preface: My Way of Studies	1
----------------------------------	---

Social Transformation

1. Another Invisible H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3
2. New Studies of “Another Invisible Hand”	19
3.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31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45

Social Stratification

5.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61
6. New Studies of Changes in the Interest Distribu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79
7.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of the Rich-poor Gaps and Social Policy	98
8. Consumption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n Important Tool in Economy	106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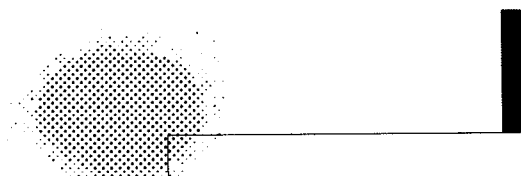
9.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s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 Survey of 508 Enterprises in Ten Large Cities of China 121
10. Networking: A New Trend of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A Survey of 200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Beijing 137

Employment

11. Out of the Shadow
——A Study of Human Capital Failure among the Laid-off
Workers in Northern China 157
12. Unemployment of Old Industrial Regions: Market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ization
——A Study of 9 Bi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North-east China 177
13. The Logic of Employee Involv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
14. China's Employment: Challenge and Choice 205

Rural Economy

15. The Way and Mode of China's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ast
century 221
16. Urban Industry in Chinese Villages 263
17. Social Network of Rural-Urban Labor Migrants in China 277
18. Great Transformation: End of Villages
——A Study of the Villages Located in Southern Urban China 295



社会转型研究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等^①。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阐述。

人们一般认为，就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而言，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国家干预，一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实际上，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并且中国经济处于含义更加广泛的非平衡状态，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结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结构转型作为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将以它特有的方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资源配置的方向，这种力量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都是无法概括的。在一般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推动力，而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过程中，这种力量的作用日趋明显。

一 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

（一）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

在描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增长”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交替使用。在很多场合，它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然而，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区别，代表着两种发展观。

经济增长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提高。只要一个国家的商品产量和劳务量相对于人口增长来说提高了，就可以把它看做经济增长了。二

^① 参见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4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次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传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主旨就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数量增长为目标。这个时期在理论上出现了较有影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罗宾逊增长模型、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理论等等。联合国在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中，也规定了不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不低于6%。1969年应世界银行的要求提出的皮尔逊报告以及1970年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提出的廷伯根报告，也都代表了这种传统发展观，即认为经济的增长是发展的捷径，只要把蛋糕做得大一点，就可以有更多的剩余分配，从而最终消除贫困现象。此外，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在殖民体系崩溃以后继续享有传统的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也运用各种手段把第三世界纳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并希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效果能够有“示范效应”。基于这种背景，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理论界存在着普遍的“增长热”，报纸、广播和政治演讲中充满了各种关于经济增长的词汇。

但是，到7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滞胀”的困难局面。不可再生的资源大量消耗，片面增长带来环境的日趋恶化，受害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战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消除贫困，而且由于发展的畸形，造成贫富悬殊、利润外流、债台高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等等。平民教育、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社会进步因素都被当做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在此情况下，曾经一度在欢快的气氛中十分响亮和时髦的“增长”一词，似乎突然蒙上了悲观的色彩。

“无发展的增长”这句名言大概是对以上状况的精辟概括。它表明，社

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莱德弗尔德的民俗社会和都市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贝克的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类型二分法学说最终得到一种经典的概括，社会被归结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基本类型，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门槛，只有一朝跨过才能进入现代社会。

事实上，在所有这些理论中，人们对“传统”的界定往往是十分含混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习惯于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然后从这种类型的反面去推导传统社会的特征，似乎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泾渭分明的，而在所有那些被称为“传统”的东西中，最具有传统特征的又是价值观、行为规范、心理状态、信仰等非经济因素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近30年来，

6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题的一种重新发现。

注重社会结构和事物的空间安排，这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兴趣。但直到进化论出现以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探索仍主要是一种静态研究。社会学的创立使人们把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与社会过程联系起来，即在研究社会运行过程中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但是，那时人们的主要关注点是探索历史表象背后的统一规律。亚当·斯密在经济领域发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无疑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结果，同时也为推动这种努力打了一针兴奋剂。但自此以后，人们对“统一规律”（如结构变动的三段式逻辑）的探索都没有超出抽象分析和经验观察的局限性。

直到本世纪^① 60年代末 70年代初，人们才在社会领域对结构问题重新有所发现。这种重新发现的标志之一，就是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经济社会结构的考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 1966 年推出《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他通过对大量历史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对经济增长中的产值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国际依赖关系等诸方面的变动，都进行了多国之间的比较研究。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还对与社会结构的经济特征相联系的非经济特征（如人口格局、政治结构、文化特征、社会整合程度等）尽可能地进行了数量分析^②。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论，从另一个方面引起人们对结构问题的重新关注，他从研究“劳动力剩余经济”入手，考察了“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③。他用结构分析方法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已成为人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结构变迁和转型的重要理论框架之一，这种理论框架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劳动力转移、收入分配结构等具有特殊的意义。

事实上，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经济社会结构的考察是对传统—现代二分法的一个有益补缺，因为它可以使更清晰地看到经济社会结构不同层面的变动时序和具体的变动轨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更具代表性的是钱纳里的研究。他正是通过经济增长长周期的数量分析在理论上把结构转变和工业化过程紧密地联系起来。早在 70 年代初，钱纳里根据掌握的统计资料，对 100 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在战后 20 年中（1950～1970）的经济结构变动趋势进行了数量分析。他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把发展过程分为从人均 100 美元到人均 1000 美元 9 个阶段，然后考察每一阶段上经济社会的 10

① 本书中凡涉及“本世纪”，均指 20 世纪；“上世纪”均指 19 世纪，编者注。

② 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编著，戴睿、易诚译：《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③ 参见阿瑟·刘易斯著，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个方面共 27 个相关变量的变动趋势，以期了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具有的结构变动特征。这 10 个方面被分成三大类：一是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二是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构成、生产结构和外贸结构；三是人口变化及分配过程，包括劳动力构成、城市化、人口变化和收入分配^①。

从 60 年代初开始，社会学家也在探索以数量指标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那些描述现代化社会结构特征的数量指标，一般被称为社会结构转型的“临界点”。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 A. 英克尔斯在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6 个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抽样调查后，提出了现代化国家结构特征的 10 项指标。这个指标体系除选用了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外，还包括了成人识字率、大学生占人口比重、人口净增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一些公认的重要社会指标，从而反映了社会发展观在近几十年中发生的深刻变化^②。

从以上我们对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到，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二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点

社会结构转型并非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资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表现出若干不同于一般发展进程的特点。

（一）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

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转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的动因是经济改革，这是确定无疑的。

首先，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促成各种新要素的产生和导入。在体制要素方面，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所有制结构，改革了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使生产管理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价格体制、分配体制、外贸体制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规范要素方

① 参见钱纳里等著，李小青等译：《发展的格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第 9 页。

② 参见 Inkeles and Smith, *Becoming Moder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